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学博士文库

杨建新 主编

青海民族教育 近代化的 困境与选择

● 李臣玲 著

QINGHAI MINZU JIAOYU JINDAIHUA DE KUNJING YU XUANZE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学博士文库

杨建新 主编

青海民族教育 近代化的 困境与选择

● 李臣玲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海民族教育近代化的困境与选择/李臣玲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6

ISBN 7-105-07055-2

I. 青... II. 李... III. 教育事业—概况—青海省
—1900~1950 IV. G5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761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90 千字

印数: 0001 - 1000 册 定价: 1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总 序

努力提高研究生的“三创”水平

杨建新

《兰州大学民族学博士文库》是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少数民族史在校博士生的专著丛书。对博士生,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在学期间就出专著,但对他们撰写专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作为导师,我认为给予一定的支持,是很必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能撰写专著的博士生,大多都是有多年教学、研究和工作经历,且多为有高级职称者,他们有学识方面的积累和能力;另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对培养博士生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简单来说,就是要把研究生培养成有创造精神并具有创造能力的人。

20世纪90年代,提高和培养学生创造精神的紧迫性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学前教育到博士研究生的教育,都面临着在“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旗帜下,重新调整自己的教育目标、教育理念的问题,以至面临着教育体系的大潮。相对来说,中小学在这方面已有较大突破,而研究生教育反映相对迟缓。在人们的常识中,研究生教育本身就是研究性学习,是研究生自己在科学研究中完成学习任务,或倒过来说,在学习过程中完成科学研究任务。事实上,这样的认识,对当代的研究生培养已远远不够!

因为,问题已不仅仅是完成研究任务或学习任务。对研究生学习阶段来说,时代对他们提出的根本要求就是成为创造型的人才!研究生必须具备创新意识,有对创新性机理的认识和理解,有创新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方法,有从事创新性实践的积极性等几个条件。总结我自己的长期以来的研究生培养经验,我认为在培养创造型人才过程中主要是引导研究生提高创造意识、提高创新能力以及培养创业素质。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提高研究生的“三创水平”。

—

创造意识,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应具有以下几个认识:

当代科学家用大量科学实验证明,创造能力不仅仅是人类的群体能力,而且,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创新能力。认识这一点很重要。从大的方面讲,它关涉国家或民族兴亡;从小的方面讲,它关涉个人能否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在此也可以套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话来说明:对人的潜在创造能力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研究的问题,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中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实践问题。对人的潜在的创造能力的开发,提高每一个人的创造意识,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家、社会学家探讨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管理学家为那些企图实现社会组织重组或扩张的管理人指出的不二法门,更是当代主流教育的一个核心话语。

创新是当代各学科发展的要求。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促进了当代各个学科快速发展,整个科学世界(包含社会科学)的图景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众多知识综合生长点和学科结合部的出现,是当代各学科发展面临的共同现象。在最近几十年以来,科学知识是呈几何级数增长,更有人说,20世纪60—70年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已经超过人类历史上科学发明的

总和。传统的学习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显然已跟不上科学发展的要求。因此,创造性的学习,在科学研究中追求创新、实现创新,成了这个时代各学科对它的研究者、学习者的根本要求。

创新是当今社会上各种职业对人才的要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伴随这个时代的到来,社会上各种职业对人才的要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从传统的流水线工作模式中解放出来,个性化、创造化的工作,成为这个时代各个职业对人才要求的一个响亮的口号。研究生同样要接受各个职业的选择。提高“三创水平”,是我们学习中的重要目标。

创新是振兴中华民族的要求。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就从民族振兴的高度,指出了“创新”的意义。一个民族创新能力最终要通过他所培养的人才群体来实现。研究生教育是我们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主要途径或手段之一,研究生将成为我国高级人才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是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很大问题。最近,经胡锦涛主席亲自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我国人才工作还存在不少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创新型人才短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关系到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

怎样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对于研究生来说,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同时,这个问题也是教育界正在极力探索的一个紧迫而严肃的课题。达成理论上的共识,也许要相对地容易,但要取得实践的成效,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综合当代各个教育家的看法,我们不妨这样说,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必须打好三个基础。

(一)创新的知识基础

没有一个牢固的知识基础,创新就成了无本之源。对研究生来说,拥有的知识能否成为创新的基础,可从三个方面来把握:第一,知识结构要合理。前面我们说过,当今的科学正向综合化和整体化趋势发展。科学研究的哪怕很微小的创新都是在几个学科知识合作的基础之上完成的。但应该明确,结构合理,不等于知识的面面俱到。以某一个学科为主,其他学科为辅,建构自己有特色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这样的知识结构才是合理的。第二,知识要系统。最少,系统地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是提高创新能力的必备条件。有一种人,听起来什么都知道,显得很博学,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东鳞西爪、支零破碎的常识,形不成系统的知识。在这种常识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有所创新的。第三,知识的内容要前沿。当今,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新思想、新理论、新概念、新观点不断在出现,要想在学科领域有所创新,必须掌握和站在学科前沿,否则,在当今的学术领域想要创新,那只能是梦想。只有保持知识的前沿性,知识创新才有可能,科学研究才能保持先进性。

(二)创新的思维基础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科学研究讲究理论思维。首先,要勤于思考,一个研究人员,脑子里随时有问题需要回答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基本素质。研究生是什么?研究生就要满脑袋是问题。其次,要善于思考。也有这样一些研究者,他们虽然有满脑子问题,但却没办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加工,科研最终没办法取得突破。从当今的科学水平来讲,善于思考,主要是指能够熟练运用三种思维,即理性思维、辩证思维以及逻辑思维。

(三)创新的技能基础

技能基础简而言之,就是表达系统、信息系统以及外语系统。(1)表达系统就是要学会多种表达方式和多种表达手段。当代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以及一体化,要求科学研究成果经常要用多种

方法表达。譬如民族学研究,就不但要用传统的文字记录的方式表达,而且要用到先进的音像技术、实物展示、文化表演等等多种手段,不但要利用传统的文本,而且能广泛使用多媒体、网络等载体。(2)信息系统主要是指研究者围绕自己的科研建立一个获取信息的途径及手段系统。信息系统灵畅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科研的效率。(3)外语系统。外语既是研究者获取外国同行前沿信息的重要手段,又是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推向国际的重要手段。这已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

三

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坚,不但要学会创新,而且要培养创业素质。创业是每个研究生都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从国家的要求来说,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新一代具备良好的创业素质。对每一个研究生来说,要成就自己的事业,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创业素质。创业素质是一个人创业能否成功的桥梁。创业素质的内容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们暂且避开它的内容,在此简略谈谈它包含的三个根本要求。

首先,坚忍不拔、不怕失败的意志。无论是创新还是创业,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要面对重重困难,都可能面临无数次失败。追求的事业越大,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大。没有一种坚忍不拔、不怕失败的意志,就很可能被困难吓倒,从而半途而废。

其次,团结共进的胸襟。居里夫人独自发现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工作,都需要团体的共同努力,团结共进是创业者的基本胸襟。用时髦的话来说,叫发扬团队精神。

最后,实事求是的作风。实事求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我国三代领导人都强调实事求是的作

风。无论是在一般的社会性工作中还是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实事求是都是一个基本准则。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追求真理,更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教育部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最近几年,博士研究生教育获得了很大发展。围绕中心的科研课题,博士研究生们做了大量科研。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套民族学博士文库是这些科研成果中的一部分。这些作者,大多数都有长期的教学科研实践,所写专著,也大都是在他们长期科研积累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尽管其中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总体上,这套书是成熟的,有着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学风扎实,立论严谨,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原本是想详细地向读者介绍这套丛书,却谈了一些对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权且代序吧。

序

半一之

—

李臣玲女士近日写就的一本书稿《青海民族教育近代化的困境与选择》，共分七章，二十余节，我成为该书的第一读者，未付梓以前即得以饱览全貌。这是著者对我的一种信任。著者要我对该书稿写点文字，算作序言，于是就得认真思索一番了。面对这宗文绩，拒绝呢还是接受？如要拒绝，不好开口。著者于公元 1998 年至 2001 年，曾经跟我做了三年研究生，授予硕士学位。其硕士学位论文即是对河湟地区儒学教育向近代化教育转变的历史研究，约 5 万字。既然为人之师在先，而后怎好拒绝？如要接受，也得认真想一想，不能随随便便地提笔落笔，需要思而后能定，定而后能文，基础在思，再文思。思索、思维，须遵循一定原则，须付出一定工夫，所以才会不负所托，言之有物。为人写序，岂易为哉？

纵观全书上下，贯穿一个思想，不是就教育谈教育，而是把教育放在整个社会综合系统工程中，从教育与该教育所服务的社会两者互动关系中去观察去解剖，从而摸清其特点是什么？规律是什么？当然也就会看清其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了。任何社会，任何政权或统治集团，都重视教育，都会把教育当作大事来办。只有那些眼光过于短浅或立志要破坏人类文化教育的人，才会不重视教育或者仇视教育。当然不同社会、不同政治集团，对教育理念、课

程内容、教育价值观、人才观以及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财政投入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等方面,有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办法,但是都不会是漠然视之的。为什么?如果看到教育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纽带,是文明得以传承延续的根本,“天下国家之命脉”,是人脉文脉,当然会给予重视;如果认为教育可以“化导愚顽”,有利王化,也会给予相当重视;如果把它看做是为自己集团培养干部,培养追随者,甚至培养有一定文化技能的劳动者,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也会给予相当重视的。总之,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不重视教育的政治家是没有的。但是教育与所处的社会的关系是互动的,教育往往有相当的超前性,教育促动社会,社会又支持教育,这是良性互动,是一般规律。可悲的是,我们中国到20世纪初,近代教育才姗姗而来,又处境艰难;在地广人众而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处于落后的青海地区,其教育的近代化,该是如何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这就是著者对该书倾注的一腔热血和一往情深。总之,青海教育近代化来的更晚,来势更弱。晚得让后人扼腕叹息,弱得前进中弱不禁风。读史者不得不慨叹:教育近代化来得何其迟也!何其难也!

教育近代化,是依托于社会近代化的。而近代化社会是社会发展史上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即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入工业化社会。传统社会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而是连接和传衍中不仅要吸收新的内容,而且还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尤其是汉代雄风,唐朝强音等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问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速度实在太慢,一个封建时代走了两千多年,还没有清醒地走出来,尤其公元15世纪以后,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有几个世纪闭关锁国,不睁眼睛看不见世界,关着门自己整自己,对着落日的光辉盲目欣赏赞颂陶醉,却不知道外部世界进步到什么样子了。直到1840年被外强用利炮坚船打开国门以后,只会莫名其妙地挨打、

屈辱、割地、赔款。大约有一百年时间在不停的内乱、饥饿、革命及反抗侵略中度过,成为列强的受气包,其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在于我们没有近代工业化及工业化文明,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西方16世纪就有了工业革命,就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我们都迟了约300年才被逼着走上近代社会,其原因是什么呢?总而言之,应该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去找原因,这不是这篇小序所能讨论和解答的,不说它了。但要说一点我们大家不应该忘记的话:长期只知道中国,不知道世界,等到国将不国,被打的睁开眼睛的时候,还抱着祖宗牌位不放,端着架子不放,清朝末年被人拉着拖着打着骂着羞辱着走上“情非所愿”的近代的路,是被逼出来的,不是自觉自愿地走的。所以,在近代化前进道路上艰难重重,曲折重重。对于这等方面,如果肯睁开眼睛看看青海,就更能启人心智了。当然在这等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的顽强生命力,终究会展现出民族的再生力,那是以后的事。

二

从清朝末年轻民国时期,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学界政界普遍认同这段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在老的传统中国被逼着拖着不情愿地走进的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奇怪吗?不奇怪,只能不得不如此。其中半殖民地即资本主义的成分(艰难地发生起来的),从东部沿海地区,往中部再往西部,尤其是处于西北腹地的交通闭塞的多民族的青海地区,就很难发生很难成长了,几乎看不见的。那么青海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呢?是非常传统的封建社会。社会系统运作的核心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此二者构成社会经济基础;也包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主要的如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等等。对于青海建省(1929年1月)以后到1949年约20年时段,在东西长约1200公里,南北宽约

800 公里,土地面积 72.12 万平方公里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做一番认真的分析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本人曾写过关于省情研究的若干篇系列性文章,在学术界泛泛东流中激起过清波浪花,自成一家之言,引起应有重视。这是认识近代青海(或者说旧社会)的最基础性的门径。

人们从事什么事业,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自然生态环境制约。在青海省 72 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上,冰川、雪山、沙漠、戈壁、石山、盐沼等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约占 44%。东北部 2800 米海拔高程以下至 1650 米的湟水谷地和黄河谷地,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5%,因其气温适宜,水源充沛,是南北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连接部,自古以来就是优良农业区,承载着全省总人口的约 2/3。其余广大地区属于高原草甸牧业区,海拔 3000 米至 4000 米,约有草原 57000 万亩。这大片草原与长城以北蒙古草原、新疆准噶尔盆地草原,西藏草原,甘南草原以及河西走廊(在“汉开河西”以前也是草原),是联结一气的,呈大“弯月形”。加之,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综观南北的汉藏交汇处的民族走廊,交错而成的大十字架交通网络,于是构成了东来西去,南下北上,有的外迁,有的留驻的多民族地区,农业区是多民族,牧业区同样是多民族。自元明而清朝而民国,世居民族除主体民族汉族以外(约占 60%),有藏族(属羌藏系统),有蒙古族(属塞北族系),以上二者是牧业区的主要民族;有回族、有撒拉族(二者均属于伊斯兰文化族系,与西域突厥族系渊源连绵),还有土族(主源为鲜卑吐谷浑遗裔,加上逐渐吸收羌、藏、蒙古、汉人,在河湟土地上形成的兄弟民族),以上三者和汉族是农业区的主要民族。综合计量,人口数量不多(解放前夕 140 万人,目前 530 万人);农田面积不多(解放时 524 万亩,其中川水地 65 万亩,其余为浅山地和脑山地。目前全省 860 万亩);牲畜数量也不多(解放时 750 万头,目前 2300 万头)。但是民族族系多(汉族系、羌藏系、鲜卑蒙古系、突厥伊斯兰系),语言多(汉族、藏族、蒙

古族、土族、撒拉族),文字种类多(汉文、藏文、蒙古文和新创土文)以及宗教信仰者多(藏传佛教:藏、蒙古和土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回、撒拉族几乎全民信仰;道教:汉族、土族民间信仰;汉传佛教和天主教、基督教:都有信徒,但人数不多)。总之,是比较典型的民族省(地区)。如果要正确认识 1949 年以前的或者说近代的青海,对上述情况理所当然地不能不有所了解。

三

甲,首先看牧业区 草原属于高原低草牧区,不是最优良的。畜种有牦牛、马(河曲马、大通马)、羊(藏系羊、盘头小尾)和骆驼(茶卡一带)。牧业方式主要为传统的游牧和天牧,没有草原建设、畜种改良和定居。牧业生产工具,简单落后,机械和手动机械尚未出现。放牧仍然用鞭子、甩石等;收毛用剪刀、刀割,甚至牛毛用手拔。盛奶和打酥油,系木制工具,铁器很少。青南地区有的依然用石器(石刀等)。逐水草而居,有冬窝子、夏窝子;住帐房(藏民住黑帐房,蒙民住穹庐式白帐房)。总之,停留在自然经济阶段,适应自然而很少改造自然,勉强在简单再生产的道路上循环,灾害不断(主要是白灾即雪灾,黑灾即疫情)。当然,生产力是低下的。例如:畜产品,一只绵羊年产羊毛 0.5 至 1 公斤。1933 年全省羊毛产量 500 余万公斤,1949 年 400 余万公斤。除羊毛以外的畜产品,与市场基本不挂钩。奶产量虽大,全部就地消费;牛羊肉也主要就地食用;牛羊皮除以赋税形式交给旧政府外(如,1949 年征收牛皮 18500 张),很少投放市场。马匹自用和供应“青马军队”外,销售作耕马、挽马的很少。基本上是封闭型自然经济。牧区有简单的手工业,皮张加工、缝纫、木工、银匠(汉回流动匠人)等,工具简陋,牧业空闲时劳作,无固定作坊,是依附于牧业的家庭手工业。按理说,牧业本身需要农牧产品互流互补,商业应该发达。姑且不论历史上的

“茶马互市”，也不谈民国初年停止了的外商洋行，牧区属单一型经济，内部分工很不发达。除少数不劳而获者外，90%以上人口都从事牧业。专门从事运输业的或畜产品加工业的，几乎没有。广大牧民的商品观念非常淡薄。牧区中不多的几个商业点上的粮、茶、布匹等物，为内地来的汉、回商人（称之“客娃”）或寺院僧侣或王公千百户所垄断。广大牧区集市很少，不少地区初级市场也没有。

藏区的生产关系和千百户制度 长期以来，草原占有制度有三种形式：一是部落公有，实则千百户所有；二是寺院所有，实则寺院上层僧侣占有；三是牧主占有，牧主大多由部落贵族家庭分衍出来的。总之，是封建占有制，其中封建领主千百户占有制为主要成分。除草原外，另一种生产资料兼有生活资料性质的牲畜占有情况：占户数7.2%的千百户牧主占有牲畜总头数的92.4%；占户数92.8%的牧民，只占有牲畜总头数的7.6%，其中相当贫穷牧户几乎一无所有。自清代雍正时对藏区普遍推行的千百户制度，封土司民；道光初年又对黄河以南编制牌户，设置千百户；民国时期沿袭未变（解放以后1958年方予变更）。各地千百户都有一套统治机构，执掌兵刑财税。他们是各地的基层政权或者土邦君王。执行什么法律呢？不是民国之法，也不是大清律例，而是清雍正时颁布的“番例”68条。至于藏传佛教寺院，维持政教合一统治体制。总之，藏区的社会性质，用简单的“封建社会”词语，难以表述出其特点，应该说：仍然处在封建领主制阶段。

蒙古族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王公制度 蒙古族与藏族居住在相同的草原上度着游牧生活，其社会生产力水平与藏族大致相同，不再重复。其社会政治制度，自雍正三年割界编旗，封授王公扎萨克以来，直至1949年延续未变。只是其人口和牲畜头数200年来不断减少。草原占有形式，名义上属“旗”公有，实际上属王公所有，草场权掌握在王公扎萨克手中。他们还可以用“布施”或“陪嫁”的名义将草场连同牧民送人。各阶级占有的牲畜头数相当悬殊：贫

穷牧户人均不到 25 只羊,有的一无所有,而王公家人均占有上千只羊或者更多。王公贵族以无偿劳役和畜租、雇工等方式进行剥削。蒙古族中传统的封建领主并没有任何解体现象。蒙古王封爵分六等,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六等爵者仍称台吉。旗扎萨克即旗长。蒙古族的旗制(下有佐领,达噶齐即什长)一直延续到青海解放。蒙古族同样不执行全国统一的法律,自清代雍正以来直至民国一直执行“蒙古律例”。这个律例依 1640 年的《卫拉特法典》而摘录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封建领主的权益。各旗扎萨克是司法审判官。总之,这样的社会,封建领主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

青海牧区,包括藏区和蒙古区,仍然基本上停留在封建领主制社会阶段。

乙,其次看农业区 就空间说,基本上是清代原西宁府及其所属七县厅的范围。就居民说,有汉、回、土、撒拉族等。从生产力角度看,各民族间无甚差别,大致相同;从社会进程角度看,各民族间则有差别。看社会生产力状况,其主要因素是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等。

劳动对象 主要指农田土地。一年一熟。川水地是保收田,当时水利不发达,只 70 余万亩,占土地总数 17% 左右。浅山地怕旱歉收,脑山地多种青稞,土地湿度大,无干旱之虑。

作物品种 比较简单,粮食面积占九成以上。主要为春小麦、青稞和洋芋、蚕豆等。油料作物(油菜籽、胡麻)面积不大。经济作物甚少,属于低消费型自然经济范畴。

生产工具 是区别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没有近代农业机械,甚至也没有手工机械和播种用的“耧车”等,主要是手工使用和畜力曳驮的木制和铁制工具。“二牛抬杠”犁土深度五寸左右,或用铁铤翻土,而后撒种。畜力拉的具有犁铧犁镜的犁,很少见。收割用手持镰刀,西宁、临夏的红炉打造。脱粒用石碾和连

枷,没有脱落机械和风车。粮食加工,用激水转磨,也有手推磨。总之,是技术简单低劣,生产效率低下的工具,是适应自然经济型小农经济的。

劳动者 各民族农民,包括汉、回、土、撒拉和藏族,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家庭为社会基层单元和基层生产单位。撒拉族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取消土司制度;湟水流域土族地区及民和县米拉沟回族,三川土族的土司制度于民国二十年(1931)明令取消,“粮归大仓民归县”。原先土司制度下具有人身依附身份的人,变为齐户编民的自耕农了,不再是世代“种一份田,交一份粮,当一份差”的封建领主的属民了。

农作物产量 川水地单位面积产量并不低于东邻若干地方,但总地亩平均计算则显得颇低。循化县川水地亩产 150 公斤左右,全县平均亩产 50~60 公斤。民和县平均亩产 35~60 公斤。大通县 50~55 公斤,互助县 50~75 公斤。1949 年海东各县总平均亩产 60~65 公斤,人均占有粮食约 200 公斤(《青海解放十年》56 页,青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总之是粗放的低产农业。

农村手工业 依旧依附于农业,以家庭副业形式存在,商品性独立手工业者很少。农村中各类工匠绝大多数是农忙务农,农闲做工;农户自身都生产一些用具用品。这是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的表现。

农村集市和农户经济生活商品率 农户的剩余农副产品需要有易无,“抱布贸丝”式的集市在历史上两千年前就有了。这里的集市出现的不早。农区一些县城如碾伯、循化、湟源、贵德,在清代已是定期开市的集市,清末至民初,这些地方有的开设洋行,为时不久停止。县城以外的集市除民和县的官亭、马营、湟中的多巴、汉东,因位于古大道上,在清代已有店铺成为集市外,其余集市多是在民国时期或者更具体些在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形成,如循化的白庄集、街子集,于 1938 年以后形成。据资源委员会 1947 年